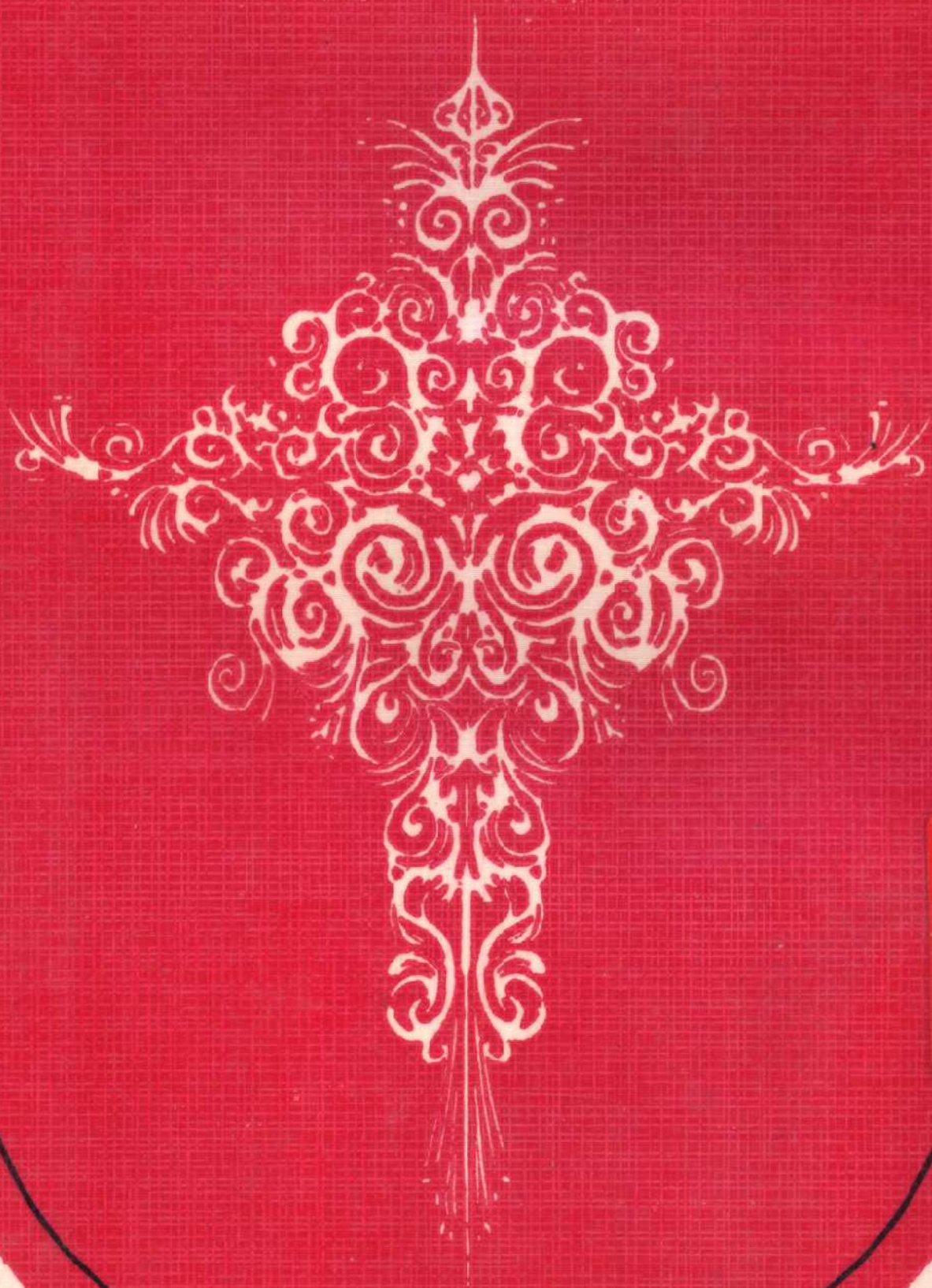


事和人代近

行印局書民三 / 著湘相吳 / 133 庫文民三



目 錄

七十年來中國的幾件大事·····	一
「建立民國」原則的成就之檢討·····	一五
中國現代幾項成就·····	三一
民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四五
當前學術教育幾個問題·····	六〇
龍璋與中華民國工黨·····	六八
宋教仁獻身民國·····	八二
袁世凱殺害宋教仁的真正原因·····	八九

抗戰期間兩「過河卒子」	九三
姚從吾教授盡瘁史學	一一三
武士敏抗日殉職	一二〇
包遵彭壯志未酬	一二八
王夫之的志節	一三六
「五四」以前的北京大學	一四一
國父孫中山先生與南洋	一四九
七十五年前的往事	一五八
洪門的光榮傳統	一七〇
中國門戶開放政策探源	一八〇
「戊戌變法史研究」之介紹	一八八
附 錄	

大眾傳播與歷史	一九七
香妃與左宗棠	二〇〇
歷史上的楊家將	二〇五

七十年來中國的幾件大事

每逢新歲開始，許多報刊都滿載紀念中華民國開國的文字圖畫。今如上溯到一九〇一年更可顯現中華民國創業的不易，也更能體認我們能夠卓立於二十世紀詭譎多變的世界之難能可貴。試看自一九〇一年以來，我們在「瓜分」「國祭共管」的聲浪中：國都三次被外人直接或間接的佔領，國土被敵騎踐踏蹂躪將近七次，中華民國的國名一次被取消，一次面臨興廢絕續的危機；這樣危險震撼的遭遇實在是幾千年國史上空前未有的。然而全國國民民族意識的普遍覺醒、近代知識的日見進步，終使我們幾次衝破難關：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國，獨立抵抗日本軍閥的侵略，同時又不屈不撓與共產帝國主義奮戰近四十年。這些悲歡古樂是值得回憶的。祇因篇幅限制，這裏僅能擇取一九〇一年、一九一一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三一年、一九四一年、一九五一年的有關現局的大事述評。

一、辛丑和約與國民觀念的誕生

一九〇一年，是二十世紀開始的第一年，這一年對於中國人應該是最不能忘懷的，因為北京議定書（即所謂辛丑和約）就是在這一年九月七日簽訂。這是前此一年發生的義和團運動的不幸後果。

義和團運動原是當時中國人對於外國侵略的一種反抗，是「自強」「維新」兩運動失敗以後繼起的另一方式的救國運動；嚴格地說，實在是中國和西方文化在互不了解下的一種衝突。中國人沒有虛心的用知己知彼工夫，盲目地採取這一途徑和方法固然是愚不可及，責有攸歸。但外國人憑藉強權一口咬定「這是野蠻的中國人的排外舉動」，因而提出「不可改易」的辛丑和約以示「膺懲」，不僅絲毫沒有觸到中西關係癥結的所在，並且更火上加油，促成新衝突因素的產生，對於二十世紀世局的大紛亂尤不能辭其咎。試看俄寇在辛丑和約中取得了賠款的最大配額，却不受撤兵規定的約束，繼續霸佔我東三省，終以引發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而自赤色共產魔王取代白色沙皇以後，更於一九二四年唆使中共於九月七日發動一全面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週」，利用這一重大國恥紀念日，肆行煽動，其影響直及於當前世局的發展。至於日本軍閥既於一九三二年以後利用這一條約不設防的規定自由進出北平天津，蠶食華北；復於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在東

京南京連夜會議搶先美英一日正式完成廢除這一條約規定特權的一切手續，以騙取中國人的好感。都可顯示野心國家如何從各方面利用這一條約以滿足其本身利益。同時也說明二十世紀中國許多禍亂都是與這一條約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是則一九〇一年給二十世紀的中國帶來的陰影實在太重大了。

但禍兮福所倚，就在這同一年，二十世紀中國新希望的光芒也開始顯露。一九〇〇年秋，中山先生在惠州、廣州起義，雖不幸功敗垂成，然而一般人對他的言行觀感已開始大轉變。日本和英國朝野對他的注意和支持以外，同時更獲得留學日本青年學生的參加和同情，其最著一例就是一九〇一年五月十日王寵惠、秦力山等在日本東京創刊「國民報」，提出「國民」一名詞，倡導人權民權，號召必須盡重大義務才能獲享權利。在幾千年君主專制下一般人習於被稱或自稱為「黔首」「黎民」「子民」「小民」「奴才」以後，能有這種人身尊嚴和責任的自覺，實在是具有非常重大意義的舉措。其後一九〇三年上海復有國民日日報的出現（臺灣名士連橫也是其中編輯人之一），更引伸其義加強宣傳。同時中山先生也將其領導的革命運動加上國民二字，可以說都是傳播「國民」觀念。

自「國民」一詞應用於中國，至今正為七十年，比較二千餘年習用「小民」「子民」「奴才」的悠久歷史，實在得來不易，尤其自一九四九年毛匪澤東竊據大陸宣佈「人民民主專政」，用

「人民」取代「國民」，大陸同胞就沒有應用這兩個字的自由了。是則我們更應珍惜這兩個字，並且回憶七十年前創用這兩個字時所號召的「必須盡重大義務才能享權利」，我們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呢？

二、亞洲第一民主國的建立

一九〇一年，在中國人的回憶中無論如何是辛酸的，但如果一提到一九一一年，就值得全中國的國民歡欣鼓舞了，因為這一年正是辛亥大革命爆發，中華民國——亞洲第一個民主國的建立就是這一大革命的成果。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革命黨人在廣州起義（即著名的廣州三二九之役），轟轟烈烈，展開了這一年中國歷史的新頁。七月三十一日，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於上海，更把握了由四川保路運動而擴大的革命浪潮。同時以立憲派為主要組成份子的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在這年的春夏積極活動，特別是這年七月中張謇往彰德訪問袁世凱，對於加速擴大這一全國性的大革命，都是有甚大貢獻的。

十月十日武昌首義，各省先後宣佈響應，十二月二日南京光復，二十五日中山先生自海外回抵上海，二十九日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這一大革命勝利的成果——中華民國就此產生，

前後爲期不到三月，這不能不說是迅速收功，尤其是偶一回憶十九世紀末葉「瓜分中國」的聲浪，以及一九〇一年我們在國都被外人佔領下作城下之盟，淪爲次殖民地的悲慘遭遇；今由於「國民」意識的覺醒，經過十年的奮鬥，終於扭轉頹勢並開闢一新局面，實在是難能可貴，特別值得珍愛。

然而不幸的是：獨立各省對於國是的主張未能迅速獲得協調，尤其革命黨內部對於實行革命方略的見解也紛歧複雜，但對於袁世凱聲望和能力的「迷信」，却是大體一致的：張謇讚揚宣傳於前，汪精衛調停奔走於後，梁啟超用自己筆桿結合袁軍槍桿的策略，章太炎棒黎（元洪）又擁袁的作法，在在使得中山先生除惡務盡之主張無法實行，再加以歐美各國對袁的支持，竟使這一不學有術的舊官僚贏得「華盛頓第二」的名譽，躊躇滿志暢所欲言。而舊污沒有蕩滌，民治自不能推行；袁初猶粉飾舊污以爲新治，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終則發揚舊污，壓抑新治，並民治之名而去之；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下令取消中華民國之名改稱「中華帝國」洪憲皇帝，就是這一發展的最高峯。幸蔡鍔在雲南起護國軍，振臂高呼「爲國民爭人格而戰」，才使中華民國重光。

當武昌起義以後，日本會應用各種手段反對或阻撓甚至破壞中國民主政體的出現和建立，俄國更將策使多年的外蒙古分離中國的運動正式表面化，以打擊我中國人發奮自強的信心，英法各國又起而效尤，以致中華民國在付出若干代價後才正式獲得各國的承認。這些事實充分說明中華

民國真是生於憂患，如今挺立世界屆滿六十周年，實在是多難興邦，得來不易。

三、美蘇對峙形勢的萌芽

一九二一年是中華民國十年，比較歐美民主國建立的歷史，這只能說是幼年；但不幸的是：今日中國的悲劇以及當前遠東與世界之形成美蘇對峙的形勢，就在這一年也開始萌芽了。這年七月美國倡議舉行太平洋會議（十一月十二日在華盛頓舉行），八月，蘇俄就宣佈召集反太平洋大會（最後改名遠東共產黨革命黨大會於是年冬在莫斯科舉行）以相對抗，並且宣傳這是「共產主義在遠東勝利的先聲」！

蘇俄之所以大言不慚，主要是由於列寧已體認利用亞洲各國日見增長的民族主義運動的策略，這年七月，蘇俄紅軍既佔領外蒙首府庫倫，同時中國共產黨並已於是月正式組織，成為蘇俄御用的合手的工具；日本、朝鮮、印度諸國共產黨運動也正積極展開「腐蝕青年良心和靈魂的工作」，這些行動，使得一位在莫斯科目睹實情的中國人深感隱憂：「新舊兩世界遙遙相對，同時注意於遠東，遠東地位之重要可見矣。一代表資本國家，謀維持國際和平；一代表勞動階級，謀發動國際革命。芸芸黃族、莽莽神州，其將為美利堅黃金主義之殖民地乎？抑將為多數黨蘇越特（Soviet）制度之試驗場乎」（江亢虎語）？祇可惜當時人很少人注意這警告。現在重讀此語，

實在感傷萬端。

當時國人之沒有注意這一「警告」，主要原因在以極大希望期待太平洋會議「喜訊」的實施。因爲這一「喜訊」：不僅山東問題解決了，並且簽訂了九國公約相互擔承保持中國的門戶開放——雖然，這一「門戶開放」原來是歐人用以協調非洲問題的一項政策，但從此中國可免再受「瓜分」「國際共管」（就是在是年七月又有此風傳，經美國出面正式否認）的聲浪困擾，自惟有委屈求全樂於接受，希望日本的侵略行動從此可有約束與限制。殊不知苟安不過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空前嚴重的國難即告來臨。

四、八百年來中國境內的第一個傀儡組織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襲擊瀋陽的事變，現在若干歐美歷史家已認識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但在當時却很少人了解這一事變的重要性，中國有識之士在這一事變發生前後所發出的呼籲和警告，更沒有引起外人的注意。例如著名評論家張季鸞就會在大公報再三指出：「自東洋全局論，今日或爲安危治亂之關鍵」！「如世界不能立籌救濟方法，則中國所謂優秀分子中堅人物者……顯有不自倒之危險，而數萬萬無產大眾，蓋將如不繫之舟，無帥之卒……結局難免不爲世界新興之勢力捲掠以去，使在未來的世界大戰中助演一齣重頭戲」。這是何等沉痛而坦白的

呼籲！今日面對神州陸沉的悲慘現實，固然令人有「何不幸而言中」之感；但更令人慚愧的是：四十年來我們在增進外人對中國認識與了解的工作上仍舊是毫無貢獻！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國際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我們未能利用太平洋會議以後的新局面，特別是沒有把握北伐成功前後的有利情勢，平心靜氣熟審實際，有計劃有步驟地處理國是，以致政治上演出寧漢分裂、中原大戰、擴大會議、兩廣異動等斷害國家元氣的不幸事件；在文化教育上輕易變改舊章，且嘗試所謂「大學區」制，更徒滋紛擾，益增青年的動盪不安；實在都是予人以隙自侮自伐的主要原因。

同年十一月七日，共匪遵奉第三國際的指示，在江西瑞金舉行所謂「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佈憲法大綱及土地法等。這是一九二七年共匪開始武裝暴動以後發展的高峯，也是近八百年來外國勢力影響在中國境內造成的第一個傀儡組織，它比「滿洲國」的出現還要早三個月！

五、對日抗戰與四強之一地位的形成

自一九三一年至四一年十年間，國際大局呈現空前未有的詭譎多變。但我國朝野秉「安內攘外」「以不變應萬變」的方針，緊緊把握好利用了這十年寶貴的光陰。在這十年之中，消極方

面：國軍經過五次圍剿，終於摧毀共匪在江西的基地。經過若干磋商，終於將西南西北的戾氣化為祥和。積極方面：建立了徵兵制度與法幣制度，國民愛國意識普遍的增強了，社會風氣與秩序也因「新生活運動」的推行而整齊嚴肅了，公路鐵路交通也大量的擴充與改善了。尤其是文化教育上更值得大書特書：華北各大學師生在日軍砲火飛機威脅之下，不僅「危城講學，大義凜然」，用文化力量與日人相爭持，同時更與長江珠江各地大學一樣致力各種研究，共同創造了民國學術史上的「黃金時代」。這些成就都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我們奮起對日抗戰的精神憑藉，其中有些「餘澤」並且一直流傳至今日。

對日抗戰是中國人自己救命的奮鬥，惟其如此，舉國朝野都抱着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信心，忍受一切痛苦和犧牲以從事這一奮鬥——這些雖是恆言但却是鐵一般的事實，正如抗戰勝利後撰寫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所昭示：「聯合大學初定校歌，其辭始歎南遷流離之苦辛，中頌師生不屈之壯志，終寄最後勝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歷歷不爽，若合符契」——經過將近四年半的獨力抗戰，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我們遂與美英併肩作戰，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二十六國簽署聯合國宣言，結成反侵略陣線，我們就躋於四強之一。

應該指出的：四強之一的地位，對於中國實在是應得的榮譽，絲毫沒有僥倖！正如蔣廷黻博

士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向聯合國政委會申明所提出：「試問在過去半世紀，世界上還有那一個國家會像中國一樣孤立無助地獨立支持一個主要強國的軍事攻擊達五年之久？沒有任何其他一國政府在最近五十年中會這樣作過！試翻翻紀錄看！……而所有隨後加入作戰的盟國都知道：日本的軍事力量是絕不容談笑置之的一回事！」事實上是當這「四強」榮譽提出時，四強中的美英陸海空軍正處於失利的悲慘遭遇，惟有我國軍却一枝獨秀正創造第三次長沙會戰勝利的紀錄（筆者當時會躬逢其盛，去夏在日本防衛廳又親見日方自承失敗文件）。尤其印度的向背，是日德能否真正攜手會師的一大關鍵，羅斯福邱吉爾當時都無法措手，祇有央求蔣委員長前往訪晤甘地，才扭轉由日本宣傳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與局勢。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我們在理論上精神上是與美、英結合一體，但嚴格地說來：我們獨力無助的實際情況一時並沒有顯著改變，這主要由於美、英尚自顧不暇，我對外交通又被日軍阻斷所致。但我們一方面憑藉上文所述十年努力的成果，同時更仰賴我們豐富的歷史遺產和偉大的民族潛力，一九四一年六月，全國財政會議決定全國田賦徵收實物，這在民國史上是一創舉，用中古制度以支持近代戰爭在世界史上更是一奇蹟，但我們毅然推行至今，只見其利少見其害，足證這一決策對於抗戰戡亂的重要貢獻。這實在是一最好的例證和啓示：中華民族在世界史上有其獨特的性質和地位，如果我們能平心靜氣深思熟慮檢討我們民族的文化特點，取精用宏，推陳出

新，一定可以適應新要求，使我們國家卓立於新世界。「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因此，不論一九四一年發生的德蘇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如何震驚世界，但我們也認定這一田賦徵實的決策是一九四一年中國的一件大事，由於這一決定，中國舊歷史和新歷史的光輝就交會爲一更顯得耀人了。

六、大陸淪陷與聯合國譴責共匪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一年十年間中國的歷史，再度顯明證實多難興邦的真理。但一九四一至五一年的變化却使世人大感離奇，恍如一場噩夢！在這十年間最初我們躬逢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開羅會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國家聲威發展至最高峯，所謂「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有也」。但勝利還都南京，不到四年，整個大陸竟告淪陷，海隅幸存正朔，國家地位則大非昔比了。

平心檢討這一空前大變化的由來，內在外來因素實在很多，但這不在本文範圍之內。這裡祇能就上文所述指出其中一個原因：遠東國際均勢的破壞。

一九〇一年北京議定書的簽訂，是「列強」對華政策由「瓜分」走向「均勢」的明顯表示，也是中國在八國聯軍鐵蹄踐踏之後所以能夠倖存的原因。由於這一關係，中國才獲致一難得的機

會「多難興邦」，創立中華民國。太平洋會議九國公約既更進一步將這一原則正式確定相互約束，因此儘管當時以及其後若干年中國國內局勢紊亂，羣雄分立，「列強」也只有提議「國際共管」，而不再彈「瓜分」舊調，更不敢有「獨佔」中國的行動。「九一八」以來日本悍然不顧，要打破這「均勢」，要貫徹獨霸中國的國策，遠東國際情勢就開始基本變化。「七七」「八一三」間，我國和美英還想藉九國公約來約束日本，但事實證明時移勢易，「靈丹」早已失效了。至於蘇俄則早在太平洋會議，日本尚受約束時，就已表示反對，並公開中言「共產主義要席捲遠東」了。同時列寧更認定日美競爭是決定蘇俄國際地位的一項重要矛盾，一九二一至四一年二十年間列寧史達林運用各種策略手段以利用並擴大日美矛盾，太平洋戰爭爆發，蘇俄企圖乃初步達成，日本的一切行動都不過是替蘇俄自火中取栗而已。

在蘇俄運用的各種策略手段中，滲透美國太平洋關係學會是最重要的一環，也是最具效果的一環，在戰後公開的史料顯示：太平洋關係學會各國會員不僅在加速促成日美太平洋戰爭一事上盡了最大努力，尤其是在影響美國對華政策使其轉變到有利蘇俄一事上更發生了最大的效果：以致羅斯福總統極力支持中國使成爲「世界警察」維持遠東和平的初計也被改變，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開羅會議與一九四五年二月華盛頓會議中羅斯福言行的後先矛盾，就是「被改變」的結果，也是蘇俄乘虛而入走向獨霸中國路途的一大步驟。

因此，一九四五年九月，遠東的國際形勢是：日本無條件投降了，英國也已大非昔比了——一九〇二年英日同盟建立遠東共同防俄陣線時的英國國旗正每天二十四小時迎着太陽飄揚，而今則如一位美國作家所形容的：英國人要四處找太陽了。美國則鬧哄哄忙著復員，中國固已自由獨立，但實在已經精疲力竭。遠東既無「警察」維持秩序的安定，各國又充滿戰火的災害，共產帝國主義面對這一窘境已久的良機，難道還不乘虛而入？何況它的御用工具——毛澤東早於一九四〇年一月就已披上「新民主主義」美麗外衣供作前驅——我們自己又被「勝利衝昏頭腦」，毫無警覺。

「新民主主義」最早的試驗，是一九二〇年列寧製造的「遠東共和國」，蘇俄曾利用它玩弄美日於掌上，然後在一夜之間宣佈歸併與蘇俄。祇可惜世人健忘，竟使它捲土重來於一九四〇至五〇年十年間席捲東歐與中國大陸。正如一位公平觀察家所指出：「它的欺人的效果比較它的共產正統理論更是過無不及！」

基於此，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聯合國大會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匪）沒有「接受聯合國設法終止在朝鮮敵對行為以求和平解決的建議；它（共匪）的武裝部隊繼續侵犯朝鮮並對聯合國在朝鮮的部隊作大規模的進攻」是一種侵略行為的決議，不僅是一九五一年中的最重大事件，並且是一九二一年以來的一件大事，因為共匪的真面目從此暴露於世人眼前，一九四〇年以來它

用以欺世盜名的伎倆完全被揭破。

綜上所述，可見七十年來的中國，幾乎每十年就有一項空前的變化。這實在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歷史的遺留與時代的進化所致，尤其是我們自己的努力程度和我們對於多變世界的反應遲速如何，更是決定這些變化是禍是福的主要因素。一九七一年世界已進入了「快速的革命性變化的時代」，美國並已經於一九七〇年將載人衛星發射到月球。我們每一個人的知識和努力是不能夠適應這一新時代呢？這實在是每一個人應該反省和急起直趕的。